

往事与文化人

金丁著

往事与文化人

金 丁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5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7 000 册数：1—5 000

•

ISBN 7-300-00257-9

K·27 定价：1.25元

目 录

忆巴人·····	(1)
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	(5)
记郁达夫·····	(21)
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	(33)
《少石遗诗》读后·····	(47)
在崎岖的道路上起步·····	(51)
——怀念艾思奇同志	
重读《囚徒歌》的回想·····	(57)
第三十三个春天·····	(69)
——北京，我亲爱的家乡	
青春常在·····	(78)
——读子冈病中近作有感	
和胡愈之在南洋的时候·····	(84)
记李初梨·····	(117)
与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	(127)
祝福·····	(140)
——想念艾芜	
我是怎样走上学习文学的道路的？·····	(149)
后 记·····	(156)

忆 巴 人

春节期间，几个同志在一起叙旧，大家谈到了王任叔同志（巴人）。时间过得真快，任叔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近七年了。

大概是1969年的春天，一天上午，在离我家不远的路上，我意外地看到了任叔；我发觉他一直在看我，但待我放慢脚步，他竟匆匆走向马路的对面去了。我忽然意识到周围那种看不见的压力，我们不便在大街上打招呼。在稍远的便道上，他在回头看我。

这以后我没有再遇到过他。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有同志告诉我，任叔已被遣送回乡，精神有时失常，我将信将疑，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含恨去世了。

问过一些和任叔相熟的同志，他们还不知道这不幸的消息。我感到很寂寞，谁能记述他所受的折磨与摧残呢？任叔给我的书和信，早已荡然无存，难道他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吗？任叔是有不少藏书的，他喜爱书，回乡前，他曾考虑把一些留下的书，寄存到一位老友的家里；他是想会回来用那些书的，然而他终于回不来了。

我认识任叔同志比较晚，“左联”时期，我只看过他的几篇小说，一直没有见过面。“八·一三”抗战后，我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工作，才开始认识他。任叔那时是在宣传部。他给我的印象是直率、认真，有时甚至显得激烈，对待比他年轻的同志特别热情。我在“文教”工作的时

间很短。第二年，我离上海后，只知道他正参加编辑《鲁迅全集》，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后来听他说，是在那个时候，他才系统地、认真地读了鲁迅先生那六百多万字的著作。我常想，鲁迅著作能免遭沦失于敌人之手，并印出了全集，其中是有任叔的一份劳绩的。

我和任叔来往较多，是在海外的新加坡。那是1941年，胡愈之同志在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任叔和诗人杨骚等相继到新加坡后，朋友多起来了，连平日比较沉闷的郁达夫，也显得活跃了。但国内的形势日趋恶化，不少文化界朋友，在国统区很难立足。任叔是写文章的高手，在新加坡靠卖文为生却是困难的，他于是到南侨师范去教书。

这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向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新加坡也在当夜受到空袭。到1942年1月底，日军已经席卷马来亚，攻抵柔佛的新山桥头。到1月初，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和以郁达夫为主席的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成立了。任叔同志除参加抗委会的宣传工作外，还协助郁达夫组织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形势在变化，2月初，我们听说英军准备放弃新加坡，我们参加抗委会的一些同志，便在2月4日离开新加坡，开始了我们的流亡生活。

我和任叔、杨骚是1942年4月相继隐匿到一个叫做阿莱的小岛上的。我们住的山芭（乡村）里，只有两家华侨，任叔和他爱人同杨骚都住在一位广东华侨家里。海水涨潮的时候，从港口划船到我们的住处，约需一夜时间；陆路是难走的，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极易迷路，而且野兽也多。我们的住处确实连相熟的朋友也不易找到了。杨骚是福建人，对外都靠他去连系。我和任叔都不能讲闽南话。生活是艰难

的，精神上有时也不无困闷之感，我们非常怀念祖国，渴望得到抗战的消息。在那几个月里，我们读了一些书。记得一次我去阿莱港，我爱人说：任叔和他爱人送来了米和钱，说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太小，不能只吃野菜和硕莪（一种木薯）粉。我们很感动，任叔夫妇当时的生活上并不比我们的困难少，他们尤其缺少食粮。患难中的友情是宝贵的，也是难忘的。

7月，我把孩子和爱人送走。接着任叔夫妇也和杨骚先后离开了阿莱。9月间我到了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看到了任叔。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已变成了当地的所谓“厂商”，任叔夫妇在他家里表面上是佣人。任叔说，他不想在那里住久，准备去苏门答腊东北部的城市棉兰，而棉兰对他却是生疏的。1943年初，有消息说，任叔参加了当地抗日活动，棉兰一些地方，敌人张贴着通缉任叔的照片，达夫后来去棉兰看他，说没有什么问题，他是平安的。

我再见到任叔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结束，我回到了新加坡，他和一些朋友还留在棉兰，他们办起了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报》。

1949年3月，我到北京没有几天，任叔来看我，问起了我的工作安排问题。4月，周总理和林伯渠同志约了几位马来亚回国的朋友叙谈，任叔也在座。那天饭后，他再次问起我，是否愿意研究南洋问题。他自己，不久又去印尼了。我曾想到1941年后那些战时的岁月，我想到阿莱，想到巴雅公务，也想到受敌人践踏的棉兰；作为纪念，我译了一篇印尼的小说：《黄金时代的德里》，在《人民文学》发表了。

任叔从印尼回国之后，有信给我，说是打算“重理旧

业”，第一步是先写一本文艺理论的书，书名《文学论稿》，他提出了不少问题，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期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他的书很快写成，出版了，这就是那本我觉得有他自己的见解而又结合实际《文学论稿》。

我完全不曾料到，他用巴人笔名写的几篇有关“人情味”的杂文，竟受到那样严厉的批判，他的“重理旧业”的愿望只好搁浅起来。他终于没有逃脱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冤去世了。

四十多年好象一瞬间就过去了，我苦于在悲愤中不能把过去都遗忘，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我该写些什么才更能表达我对任叔的怀念呢？任叔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对革命，他一往直前，在文学方面也是有贡献的。我想，知道任叔的同志们，总是要记起他的吧。

1979年10月

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未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叹息，
漫漫的长途，横在前头。”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殷 夫

1931年5月，我第一次到上海。对于一个从1928年受“普洛”文学影响的青年来说，上海吸引我的，是因为我相信那里有更多的机会，使我学到如何用文艺去为现实斗争服务。在上海，我只认识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孙涵冰（即严僧），我们是1929年在北平认识的，因为都喜好写诗、写小说，又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才有前途，所以彼此引为知己。

我到上海的那年春天，柔石、殷夫和胡也频等五位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柔石是年龄最大的，但也不过28岁。在他就义前不久，我读过他的《为奴隶的母亲》，对惨遭压榨不幸的劳动妇女的描绘，是鲁迅《祝福》以后所少见。我也很喜爱殷夫的诗，他有些诗，我感到即使多少年后，也会使我激动鼓舞。我曾听说从狱中写出的信里，胡也频正计划继《光明在我们的面前》，再写另一长篇。然而他牺牲了。中国的几位优秀年青的作家，来不及在文学上做出更多的贡

献，却被敌人杀害了。烈士们的鲜血，只能说明敌人的卑怯和凶残，但另一面也启示了后继者应如何投入再接再厉的战斗。

发表过《为奴隶的母亲》的《萌芽》杂志这时已经被禁停刊，“左联”能公开出版的刊物，几乎已经没有。四马路书店里零零落落地摆着几本“宠犬派”的《前锋》和“最彻底革命文学家”叶灵凤编的《现代小说》。“花树已萧森”

（鲁迅：《无题》）确实是当时出版界恰当不过的写照。

我整个夏天都住在真茹。虽然也仍在继续写我的小说和剧本，但我能拿到哪里去发表呢？涵冰先是参加了暨南剧社后又转到大道剧社的。他希望我同他一起去演剧，并且把我介绍给赵铭彝。我犹豫的结果，还是准备参加“左联”。在一次集会上，我偶然认识了楼适夷和黄白薇。适夷的《盐场》和白薇的《炸弹与征鸟》，我是读过的，我很容易地就和他们谈到了一起，但找他们却困难。适夷是有时候到《文艺新闻》去的。我当时没有职业，如何解决生活问题呢？日子是长的。

不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了，这是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大事变。上海青年在9月下旬全市大会后，北上抗日的呼声达到了高潮。我是北京人，是不是暂时回去呢？有的朋友赞成，孙涵冰却认为回去只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我于10月初回到北平。北平比上海显得紧张多了，我熟悉的一些东北籍大学生，在一个早晨突然失掉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愤慨非常，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政府命令东北军撤退，绝对不抵抗？大批的东北知识青年，这时相继流亡到北平，他们先是通过正常手续，要求政府救济，可是在财政局

门外，却受到了军警野蛮的镇压。他们也去见过张学良，可是回答却不得要领。抗日救亡运动随之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到12月初，群众感到忍无可忍，开始在东车站卧轨，声势浩大。我记得1932年，北平“沙泉”书店里摆着一本引人注目的小说：《1931，12·17》就是记录这次南京请愿示威的经过的。

1931年底，北平出现一本紫红封面的文学杂志叫《摩尔宁》，其中张秀中的一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和技巧方面，我感到都有一定的水平。是不是可以找个机会结识一下呢？我把自己写的一篇以当时学生救亡运动为题材的小说《炎》送到《摩尔宁》的编辑部，那实际上只是一间大学生的宿舍，他们对我很热情，到第二期就发表了。但我没有看到这杂志再出第三期，有人告诉我，张秀中是北平“左联”的成员。

约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前后，先是上海《文艺新闻》写信来，希望徐盈和我在北平组织《文新》读者会，后来《北斗》杂志也想组织《北斗》读者会，丁玲并写信来，介绍我认识了王芦焚（即师陀）。徐盈是1929年就认识的。我们商议的结果，觉得组织读者会的困难比较多，我们也还不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利用公开的形式，把一些不熟悉的读者组织起来。但我们却开始筹划办了个文艺刊物，自己写稿，当时北平的印刷条件还方便。我们请艺专毕业的卢淦画了个吸引人的封面：一个工人在旋转历史的车轮，于是《尖锐》这个16开的小刊物，便在北平的一些书店和学校传达室里出现了。但出了两期就被禁了。

这时上海的《北斗》和《文学月报》都发表了芦焚、徐盈和我的小说。稿子寄给丁玲，她是看了就回信的，而且信

写得恳切，有说服力。在上海文化中学教书时，我曾偶然和吴似鸿提起，蒋光慈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记得鲁迅在一次“左联”的会上，曾谈到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意义。

《尖锐》停刊不久，北平“左联”的陆绿曦（即陆万美）到当时我避居的慈溪会馆找我，他建议我参加北平“左联”工作，但我这时的处境很不安定，我写封信给丁玲，决定动身去上海。

1932年我到上海后，是通过赵铭彝才找到周起应的。铭彝在四马路附近一间书局里做编辑，他为我和起应约好，准时在马斯南路的一个图书阅览室见面，我们互不相识，但起应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几天之后，我见到了丁玲。

在白色恐怖极其疯狂的环境里，参加如“左联”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生活上，工作上，有哪些具体问题必须注意呢？“左联”的同志发表文章是公开的，有的有公开的职业，有些社会活动也是公开参加的，但住址一般是秘密的。

丁玲初次和我会面时，就特别谈到如何对待社会关系问题。以为一经参加革命，就完全割断一切社会关系的作法，是不利于工作的。我最初曾在文化中学教书，不可避免地要和同事同学来往。是在我离开文化中学之后，“左联”的创作委员会会有一个时候才改在我家里开会。

我参加“左联”后，就编到创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华蒂（即叶以群）带我到穆木天家里开的。华蒂当时负责“左联”的组织工作。木天是创作委员会的召集人，参加创作委员会的当时还有沈起予，金奎光。负责宣传工作的彭莲青（即彭慧）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会。大约从1933年起，创作

委员会改由丁玲召集，木天和起予他们都搞另外的工作去了。

我到上海后，先是住在法租界打浦桥，丁玲说，那里的环境复杂，于是搬到了北四川路横浜桥北的一个弄堂里，那里却是华界。据我所知，当时还有一些“左联”的同志都住在附近。我后来也曾住过沪东和南市，大体都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或环境发生变化。文革期间，“四人帮”的吹鼓手们，造谣“左联”的成员住在租界里，受帝国主义的庇护，其用意不外是诬蔑，给“左联”抹黑。另外，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联”是个统一战线的团体，我看也不符合事实。

“左联”是党的外围群众团体，它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要求自己的成员，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以自己的文艺作品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正因如此，和这些要求尚有一定距离，但思想上倾向进步的作家，当时就还不曾参加“左联”。

现在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和参考史料里，有的把“左联”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相提并论，我以为也和事实有出入，实际上是有区别的。鲁迅曾明确地说过：

“左翼作家不但要同那走几步的‘同路人’，而且还要招诱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来同走。”对苏汶提出的问题的争论、批评，基本上是根据这种态度进行的。

大约是在1933年初吧，杜衡（即苏汶）在《现代》上发表过一篇小说《人与女人》，故事情节很简单，在工厂里做工的哥哥被捕之后，他的妻子和妹妹都相继沦为娼妓了。难道这就是参加革命的必然结果吗？我曾同杜衡谈起他这篇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坏影响，但他认为，他写的是“真实”，

并告诉我，他的题材确有其事。

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苏汶是主张“所谓反映，即如镜子反映人形一样……美的照出来是美，丑的照出来是丑”。他不理解，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我曾根据我们之间这次的争论，把自己的看法，写了篇《第三种人的出路在哪里》，发表在北平“左联”出版的《文艺月报》上。

我想不出在“左联”的同志中有谁把“第三种人”同梁实秋、王平陵以及胡秋原等一样看待。在当时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迫害之下，对于向自己挑战的人，不能不从坏的方面设想的情绪，事实上也是难免的。不过对于苏汶所说的“作家之群”也还是有具体分析的：指出他们有的能和革命发生共鸣，一同前进。而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歪曲，现在想来，这样的分析是必要的，正确的。如果有人据此妄加推测，说是“左联”当时在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以为那恰恰是中了江青《纪要》的毒计。

记不确切是1932年底还是1933年初，“左联”召开了一次改选后的执委会。执委共十一人，当天上午到会的，有鲁迅、茅盾、丁玲、周起应、楼适夷、华蒂、彭莲青、艾芜、李辉英和金丁。为这么多同志找个安全的开会地址是困难的。我没有想到华蒂带我去的会址是在汉口路附近的一家耶稣教堂里。晚间的会是在旅馆里开的，鲁迅、茅盾和雪峰他们当晚没有参加。

这次会议使我感受最深的，除鲁迅的讲话之外，是大家在雪峰的提议下，对茅盾《子夜》的出版表示了诚挚的祝贺。《子夜》的出版距现在已经36年了，今天很少人再提起

苏汶当年是如何嘲笑我们产生不出托尔斯泰和福洛培尔的事了，那时候，即在我们自己的同志里，也有人提出过“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他们忘却了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受迫害摧残的环境里生活，而且我们大都很年青。然而《子夜》出版了。确如瞿秋白所说：“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

（《〈子夜〉和国货年》）在广阔的时代的背景上，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并且在左翼作家的创作发展道路上，也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普洛”文学运动初期，一些从实际革命工作转到文学战线的青年作者，虽然在创作上力图描绘工农的觉醒和革命斗争的绚烂生活，然而由于片面地强调文学必须为自己的阶级宣传，忽视作品是一定社会生活反映在作家头脑中的产物，所以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在创作上都显得比较突出。到《萌芽》出版时，写革命与恋爱冲突的题材也逐渐少了。柔石、张天翼和魏金枝的小说，给读者开辟了新的视野。到《文学月报》创刊之后，由于新起的生力军，多来自被压迫生活的底层，对自己努力表现的生活，有亲切的感受，所以象艾芜、沙汀、耶林和丘东平等人的作品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写自己熟悉的，在创作上形成了深受重视的倾向。茅盾是个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子夜》中的吴荪甫、周仲伟、冯云卿以至赵伯韬，所以写得真实生动，就因为有作者熟悉的生活做基础。茅盾曾经讲起他对《三人行》和《路》的不满意。如果单凭第二手材料，或仅仅从主观上的创作意图出发，即使有比较纯熟的技巧，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1933上半年，我写的东西要比前一年少多了。如何比较全面地衡量我在初学写作道路上的得失呢？执委会开过后，

我的社会活动显然多起来，而更尖锐的，是工作的实践又迫使我不能不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些理论，对许多问题必须毫不含糊的有自己的见解。例如：如何评价“五四”的文学运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论，为什么在苏联受到了批判？从文学史的发展上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去理解？如何理解巴尔扎克在政治上同情注定要灭亡的阶级，而他的作品却能使我们学到比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全部著作更多的东西？在文学大众化运动的争论中，什么问题是属于关键性的？要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我感到必须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及其有关的文学理论著作，以便从思想上武装自己。

由于鲁迅的热心提倡和积极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性文艺理论著作，这时已经更多地介绍到中国来，而瞿秋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认识到创作上为什么应该“莎士比亚化”，而不该“席勒化”，认识到为什么巴尔扎克比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懂得为什么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可以看到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这年春天起，记得周扬正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而“五四”时期不曾解决的文学的阶级性问题，文学与政治和文学与生活关系等问题，也是这时候通过对“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批判，开始有了进一步明确的了解。

1933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征得“左联”的同意，调我参加筹备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工作。在筹备期间，适逢上海泉漳中学酝酿复办。泉漳中学是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33年前不只一次为国民党反动当

局无理停办。因原在该校的主要教师，多系“上反”的成员，所以“上反”约“左联”的几个同志开了一次会，主要是讨论，原有的教师有哪些同志应抽调出来，而由“左联”的同志去接替。会是在永安公司楼上的旅馆里开的。“上反”方面出席的有刘芝明，吴际云，何烈克，李生萱（即艾思奇）；“左联”有华蒂，穆木天和我。当时决定吴际云和艾思奇继续留任，“左联”要参加“泉漳”工作的同志，则委托华蒂负责解决。

如何办好泉漳这样的学校呢？当时还不可能有长远的计划，环境比较复杂，只得“走路问路”。没有校长，教务长不是我们自己人。校委会虽有支持我们的校董和我们的同学参加，但我们没有掌握经济上的实权，教师还只能拿到很少的“车马费”。而上海的伪教育局迟迟不批准泉漳立案。初中开始只剩下三年级一个班，由李辉英担任语文课。高中则文理分科。学生多数选修文科。讲课内容，根据同学的程度和要求，不受伪教育局规定的限制，所以象弗理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和柯根的《伟大十年间文学》，我们都可以在讲堂上讲。更重要的是学生聘请教师做课外的读书会的指导。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文艺研究会”，“左联”的胡楣（即关露）就是1933年后第一次被请去讲演的，很受欢迎。不少同学是由于从文艺作品中发现自己追求的理想前景，而参加了共青团。《母亲》，《毁灭》，《铁流》和《蟹工船》，大家争相传阅。

还不到“五一”的时候，学校突然接到上海伪教育局的通知：勒令停课。同学们为此非常愤慨，为什么不给立案，反而无理要挟停课？经过校委会讨论，决定对“通知”置之

不理。泉州中学的特点之一，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福建泉州或漳州人，学校又座落在泉州会馆里，同学的意见是，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会馆里，他们要读书是合法的。教师们坚持继续上课。

当然学生里面也有几个和开初就反对复办的校董相互串通，并且制造诽谤恫吓的流言，有的甚至借故缺课捣乱，但结果却变得很孤立。

我是5月中旬搬进学校住的。课堂外的接触，促进了我与不少同学建立起更深的情谊。多数同学学习很刻苦，不少人在偷看“禁书”，在教师面前，他们有时也会热烈争论着象在《左派右稚病》和《论反对派》里遇到的一些问题。然而，我不曾感到有谁对敌人破坏的阴谋放松了警惕。

横逆的袭来是在6月的一个上午。伪公安局出动了大批警察，强迫同学立刻离校。但他们遭到了断然的拒绝。我永难以忘记敌人是如何向手挽手护守在校门前的全体同学鸣枪冲刺。那一天有48名同学在自卫的搏斗中被捕。在校的老师，都是经由同学护送，才安全离校的。

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泉州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声援，由于泉州有一些学生是华侨，所以由“华联”出面向伪公安局提出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但待到同学释放了，学校已被封闭，这间被称为“红色摇篮”的学校，以后也就未能复办。

在泉州工作的同时，我参加了由“上反”筹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上反”是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自1932年“上海大戏院”集会遭敌人镇压，组织上受到破坏以后，一直很难进行公开活动。“国民御侮自救会”就是根据公开开展工作成